



2026

年台灣地方縣市長選舉前夕，校園午餐意外成為了政壇攻防的最前線。不論是尋求連任的現任者，或是企圖入主縣市政府的挑戰者，紛紛將「中小學學校午餐全面免費」納入政見白皮書。這類標榜減輕家長負擔、落實社會福利的「政策支票」，在通膨壓力未減的當下，確實對選民具有強

大的吸引力。

儘管部分財政紀律維護者提出警告，認為無差別的補助將造成嚴重的財政缺口，甚至排擠其他教育預算；然而，在排山倒海的民意壓力與「鄰近縣市有，我們為什麼沒有」的比較心理下，地方政府最終往往只能「從善如流」。這種「政策跟風」的現象，讓全台中小學午餐正加速邁向全面由公部門買單的時代。

然而，在「免費」的糖衣之下，公民團體與教育界開始憂心這場福利競賽背後的代價。長期以來，家長繳納餐費不僅是履行義務，更是取得監督權的重要基石。一旦午餐費用完全由政府承擔，家長與學校午餐的契約關係隨之改變，這可能削弱家長參與供餐委員會的積極度，使得午餐品質的監督權重心過度向行政機關傾斜，形成「公給公受，民無從置喙」的窘境。自主辦餐本來是許多學校的特色，不過為了在有限的財政預算內達成「全面免費」的政治承諾，地方政府勢必追求規模經濟。這將導致過去強調各校特色、能根據學生口味靈活調整的「自主辦餐學校」因成本壓力而逐漸消失，在地食材的運用可能轉移到大量工業產品的取代模式。將校園廚房取而代之的，將是高度標準化、以降低成本為首要目標的「中央廚房統一供餐」模式。當午餐變成一種由上而下的配給物資，而非校園生活的一部分時，食物的溫度、菜色的多樣性，乃至於與在地食材連結的靈活性，都可能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被犧牲，也讓學生透過飲食了解在地產業與經濟模式的情況可能受到嚴重的打擊。

學校午餐的供應從來不只是「把菜煮熟」那麼簡單，它是一場涉及食材調度、食安追溯、營養調配、成本控制及廚餘處理的跨領域精密協作。在現實環境下，「成本控制」往往成為校方最敏感的神經，決定了餐盤內容的上限與下限。目前的供餐模式因地制宜，卻也面臨各自的瓶頸：

自設廚房：

雖能自主掌握食材與口味，但設備維修與人力成本節節攀升，對校方管理是極大負擔。在學校午餐均由政府補助費用的情況下，絕對會排擠補助各自設廚房學校更新設備的費用。

委外團膳：

多見於都市區學校，因校園腹地受限或供餐規模龐大，必須仰賴民間業者。然而，在利潤極大化的商業邏輯下，如何維持食材品質成為永恆的拉鋸。而且在討好學童以避免剩食的潛規則下，菜單會傾向「學童愛吃」而非「營養均衡」的方向設計。團膳共同供應的情況，也可能讓各校營養師能夠置喙的空間降低。

區域合作策略（受供校）：

透過「大校帶小校」的衛星廚房模式轉運，雖能解決場地問題，但食物在運送過程中的溫度控制與新鮮度，則是另一項嚴峻的技術考驗。

學校午餐的食材成本也因和產地的距離產生巨大的差異，在農產品原產地如雲林、嘉義、彰化等縣市，學生或許能用不到50元的成本就能享用豐盛的午餐，甚至有許多家長本身就是農產品經營業者，能提供更優惠的價格給學校嘉惠子弟。在環保當道各項產品計算碳足跡的同時，工業產品挾著大量製作壓低成本衝擊學校午餐產業，背後所造成的隱形成本或許更高也未知。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食安的高度焦慮，中央政府積極介入，由教育部、行政院食安辦與農業部聯手推動「三章一Q」政策。這項政策要求學校午餐必須優先採用具備產銷履歷、有機農產品、台灣優良農產品（CAS）三項標章的農產，以及可自主揭露產地資訊的台灣農產品生產追溯QR

Code。

這項美意在實務執行上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1. 食材成本墊高：

符合驗證的食材雖然安全性較高，但價格和一般農產品而言相對較高，在免費化政策限制了預算彈性的情況下，往往壓縮了菜色的豐富度。

2. 行政程序的繁雜：

學校營養師原本的核心職責應是守護學生的飲食均衡與推動衛教，但隨着「非登不可」（食品業者登錄系統）等各類追蹤平台的導入，營養師被迫淹沒在海量的數據登載與核銷工作中。

3. 專業能力的錯置：

當營養師與午餐秘書的時間被繁雜的「追溯行政」填滿時，真正能走入教室進行食農教育、與孩子討論飲食文化的機會反而被大幅削減，形成「重數據紀錄、輕教育本質」的倒置現象。

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小學生而言，學校午餐不只是維持生命能量的來源，更是校園生活中最具影響力的「隱性課程」。除了小學低年級外，學生每周有超過半數的天數在校共食。這短短三、四十分鐘的用餐時間，實質上承載了食農教育的多重功能：

生活素養與餐桌禮儀：

在集體用餐的環境中，學生學習分配食物、尊重共食夥伴、建立正確的飲食自律與禮儀。

營養實踐與食材認知：

透過實際接觸季節性食材，學生不再只是從課本認識「健康飲食」，而是將營養攝取轉化為身體的直覺經驗。

在地認同與鄉土教育：

藉由選用地農特產品，午餐成為連結家鄉土地的橋樑。當孩子知道碗裡的米來自鄰近的農場、菜餚標誌著節氣的流轉，這種對鄉土的認同感便會在咀嚼中悄然紮根，再透過各校特色教材的發展，讓學生能夠更深入了解地方產業發展與歷史人文脈絡。

然而，當前的社會現狀卻面臨嚴重的認知斷裂。過去台灣社會流傳著「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的俗諺，形容對事物基本運作模式的常識；但在現代都市化與食品工業化（Processed Food）的席捲下，現狀已徹底逆轉為「只吃過豬（豬肉產品），卻沒見過豬走路」，這種斷裂導致了以下深遠的負面影響：

1.商業產品的認知侷限：

學生乃至於一般成人，對於食品的認知被精美的包裝、過度加工的風味所框架。大眾往往只認得超市貨架上的標準化商品，卻對其產地來源、生產季節、甚至原始形態一無所知。

2.產業鏈知識的脫節：

由於缺乏對農業生產、物流配送與加工鏈的基礎理解，社會大眾極易與現實運作脫節。這種資訊不對稱與「農業無知」，正是導致坊間各類標榜「神效農產品」或「食品廣告詐騙」能輕易得逞的主因。

3.價值觀的傾斜：

當我們對農業的辛苦與產業鏈的複雜視而不見，就容易將「廉價食物」視為理所當然，進而忽視了糧食安全與永續農業的急迫性。

在諸多公民團體與農業專家的多年奔走與催促下，台灣終於在 2022 年正式通過了《食農教育法》，這標誌著台灣食農教育從散見於各計畫的「點狀實施」，邁向了「法制化」的新里程碑。該法在立法精神上大量參考了日本 2005 年頒布的《食育基本法》，然而，若深入對比台日兩國的法律結構與執行層級，便會發現台灣在實務推動上仍存在顯著的「行政位階落差」。

日本模式：權力核心的戰略整合 日本將「食育」視為國力根基，其《食育基本法》規定由內閣府直接設立「食育推進會議」，其地位相當於國家級的戰略委員會。由內閣總理大臣（首相）親自掛帥或指派專門家監督，具備凌駕各部會的指揮權與跟催進度之職能。這確保了從農林水產省（農業）、文部科學省（教育）到厚生勞動省（醫療衛生）都能在同一套國家目標下，打破本位主義，協同作戰。

台灣現況：部會平行的溝通瓶頸 相較之下，台灣《食農教育法》將主導機關設於農業部。儘管法案第七條明文列舉了教育部、衛福部等相關部會應各司其職，負責相關事業的推動，但在實際行政體系中，農業部與其他部會屬於平行單位。當食農教育涉及校園課程設計（教育權責）或學生營養規範（衛福權責）時，身為農業主管機關的農業部，往往缺乏足夠的約制力與溝通籌碼來引導跨部會合作。

這種結構性的設計，導致食農教育在推動時容易陷入「多頭馬車」或「各行其是」的窘境。缺乏

一個位階類似於行政院跨部會會報、並由政務委員負責統籌協調的機制，使得各部會的配合程度往往受限於預算分配或短期專案需求，難以形成長期且一致的國家教育策略。食農教育人員及教案目前也大多由農業部進行主導，所設計的教案方向較偏向農業的認識，對於中高年級增進農業對於整體經濟及社會的影響思考著墨較少，是可以再精進的地方。

食農教育的重心不應僅止於「認識盤中飧」的淺層衛教。在法制化的下半場，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突破行政障礙：強化行政院層級的統籌功能，避免食農教育淪為農業部的孤軍奮戰，教育部應將食農教育深度融入課綱，而非僅將其視為午餐時間的附屬品；衛福部則應將預防醫學的觀點延伸至產地的飲食選擇。唯有當法律不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能轉動跨部會運作的齒輪時，食農教育才能真正從「免費午餐」的政治紅利中脫穎而出，成為提升國民素養、支撐在地農業永續發展的關鍵力量。

我們必須反思：食農教育的終極目的究竟為何？是為了教導孩子辨識蔬菜，還是為了消化生產過剩的農產品？參考日本的經驗，答案顯然更為宏大。在日本的概念中，食育是一項以「食」為核心的文化整體建構工程。日本食農教育結合生活中的意識建立，日本學童不僅在學校午餐時間學習，更是在家庭與社會餐廳的每一次飲食行為中，有意識地實踐日本文化。從「我開動了」（いただきます）到「我吃飽了」（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的話語對農人辛勤與萬物犧牲的敬畏與感謝，到對在地食材（地產地消）的認同，食農產業鏈的運作邏輯已內化為國民生活的一部分。這不僅保護了本土農業，更鞏固了強大的文化主體性。既然食農教育法取經於日本，吾人就該「抄作業抄整本」，而不是僅僅用來作為部分農業場域增加收入的工具。在台灣，食農教育常被誤認為只是「中小學生的勞作課」或「營養午餐的附屬品」。然而，筆者認為，台灣食農教育最迫切的受眾，反而是那些在成長過程中缺失這類教育的成年人。

當前的成年世代（包括政策制定者與家長），往往受限於升學主義與速食文化，對農業的理解趨於單一。唯有推動全民食農教育，讓社會大眾重新理解農業在生活中扮演的多重角色，才能翻轉長久以來「輕農」的社會氛圍：

1.經濟意義：

農業不只是產值，更是國家糧食安全的第一道防線，是面對國際動盪時的穩定基石。台灣的糧食自給率一向過低，自然與飲食習慣的改變有關，而長期對本土農業消費力道的疲軟，也使農民願意持續耕作的意願降低，進而離農或捨棄農地農用的原則。

2.社會意義：

學會多方嘗試不同的滋味，不同的調理方式都是文化與創意的展現，飲食是人類接觸農業最直觀的方式，很多人是因為不曾接觸過多樣性的食物刺激，才會覺得飲食無趣，農業無用。台灣是世界上匯集最多烹調手段的地區之一，利用飲食活化國人的品味，也能帶動農業產業升級。透過食農教育理解農產品供應鏈的運作方式，減少農業謠言對社會的不當影響，對於穩定民心有正面的幫助。

3.文化意義：

由「地產地消」出發，讓飲食成為傳承家族記憶與鄉土認同的載體。不同的區域衍生出不同農產品的特色，結合地理、歷史、自然等各項課程，讓國人從認識農產品開始更了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各項事情，深化對於家鄉的認同感。

4.保育意義：

理解並認同農業在維護生物多樣性、水土保持及調節氣候中的生態價值。同時理解經濟生產與環境保育間可能有的拉扯與取得平衡的方式，對於農業生產更加尊重勞動力及自然資源的產出。

當學校午餐走向全面免費化時，最令人憂心的副作用莫過於家長責任感的疏離。許多家長誤以為，既然經費責任已由政府補助接手，自己便能從供餐事務中抽身，將午餐簡化為一種「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然而，教育的本質不應因經費來源的改變而跳脫責任。家長在學校午餐供應中，應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從「消費者」轉向「參與者」：

即使不需繳納餐費，家長仍應積極參與學校的供餐委員會，和營養師共同討論供餐內容。這不只是監督食材好壞，更是為了理解學校在預算限制與食安規範下，如何與土地連結、如何安排營養比例。家長的關注，是維持午餐品質不因行政怠惰而下滑的最強防線。

家庭是食農教育的延伸課堂：

學校提供了午餐作為教材，但若孩子回到家面對的是挑食的寬容、外送文化的氾濫、或對剩食的漠視，校園內的食農教育將功虧一簣。家長必須在家庭餐桌上延續學校的教育理念，共同承擔起引導孩子建立正確飲食觀念的責任。

重拾對食物的「擁有感」：

「免費」容易導致浪費，因為人們傾向不珍惜無償獲得的資源。家長必須與學校配合，讓孩子明白：雖然這份午餐在帳面上是免費的，但它背後凝聚了納稅人的稅金、農民的汗水與教育者的苦心。若只有老師在現場盯著學生不情不願的吃飯，這份免費的午餐背後所浪費的成本，將遠遠高

於它本來的價格。

唯有家長與政府、學校共同承擔這份「供應責任」，午餐才能從單純的政見支票，轉化為親師生共同守護的成長養分。如果家長只領取福利卻放棄參與，那麼「免費午餐」最終付出的代價，將是孩子對食物價值的徹底冷漠，以及整條農業、飲食到文化鏈結的斷裂。

回到 2026 年這場「學校午餐免費化」的浪潮，如果我們僅僅將其視為一項選舉福利，那它充其量只是預算數字的搬移。但若能以此為契機，將省下的資源投入於深化食農教育，讓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這場文化工程，其影響力將遠超出一份便當的價值。唯有建立起全社會對於農業的尊重與正面思維，我們才能在享受「免費午餐」的同時，真正體認到土地所給予我們的、那份跨越世代的「無價」禮物。

作者 林弘仁 為社團法人台灣良好農業規範發展協會理事長